

# 真理标准大讨论:出场之路与重要启示

任 平

**摘 要** 历史出场往往要经历自在的或自觉的反思。历史反思是对既往历史意义更深刻的领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40 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40 年来,重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加以批判并创造新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进入了新时代。今天,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对当年那一关键事件的出场之谜依然需要解析,对开创中国道路的历史依然需要重新理解。依据出场学视域,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出场结构作深度解析,对实践作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之间的出场关联做出场学的阐释,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及其哲学表达做出场学考察,提出的新时代中国道路呼唤哲学表达,需要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当代出场,更需要用中国理论全面、深刻、准确地表达中国逻辑。

**关键词** 真理标准;价值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哲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 B27;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5-004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08)

黑格尔曾经这样表达历史出场叙事的复调性:自在的历史与自觉反思的历史。关键在于:反思是对历史意义更深刻的理解,也意味着既往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站在新时代开端上,回望反思走过的路,前瞻未来的路,返本而开新,成为一种创新的发展方式。虽然新时代道路是以往时代连续性的效果史,但绝不是其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创新和转折,呈现出并非直线的辩证进路。40 年前发生的那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特定历史事件,它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地平线,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序幕。40 年来,沿着马克思当年的道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演了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批判以及建构中国方案进程,走出了中国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再一次抵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少,经过 40 年的日积月累,这些问题需要在战略上加以解决,需要我们作深度反思。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重新思考那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事件,对其出场之谜依然需要重新解析;对其开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 40 年来的历史依然需要做出场学考察;若干重大历史经验依然具有当代启示价值。

## 一、哲学批判与思想先导:学术话语政治语用学的出场之谜解析

哲学革命作为时代变革的先导,都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恩格斯在 1886 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叙述 40 多年前他和马克思在实践观上发动哲学革命情形所使用的笔调一样,回顾重大事件让我们返回到那个时期的现场,虽就时间而言不过距今一代之久,但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仿佛此事已逾百年<sup>[1]</sup>(P220)。那不过是一次历史的大转折关头,

是为真正结束“文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思想准备的年代。今天的一切作为效果史不过是那一变革的继续。

40年前,《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像一道霹雳和闪电,击中了中国的现实大地,迅疾引发了一场堪称大地震般的、被后世称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潮,这股热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成为一个重大事件。一个事件就打开了一个时代的地平线,其中上演着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这一针对“两个凡是”的哲学批判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哲学事件,在更大意义上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该文所阐释的实践观点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常识,哲学批判也旨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然而它却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石破天惊地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改变了中国命运。事件催生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有真正的体会,我们一时都成为“思想解放”派了。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源,不能仅仅在哲学批判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找,更要穿越到话语—思想层面背后去看思想话语所满足的历史时代需要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2]</sup>(P11)思想解放只是时代洪流的宣泄口。正像当年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是为了走向历史深处,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指向的实践也突破哲学范围而深入到造就思想话语的历史语境本身,呈现话语的语用学,故而我们应当在语境和语用层面说历史。甚至语用学都难以满足我们今天研究的需要,因为语用学仅仅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言语是行为,是能够做事的行为。无论常识或者哲学话语都能够以言做事,但是,一种话语之所以发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历史效用,不仅仅看话语本身,更要看需要话语、生产话语、让话语发生这样语用学功能的社会存在本身。因此,语用学问题只有在超越语用学眼界的出场学视域中才能得以阐释。若要深度全面地厘清上述关系,只有将这一追问转化为一个出场学问题,并在出场学视域中加以解析,才有可能。话语生产和出场不能没有历史原因。只有思想话语满足时代需要,才会被生产和出场;常识性的观点只有被用在了关键年代、特殊政治语境的关键点上,才能发挥巨大语用学效用,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思想之矛。因此,这一事件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只有在思想的社会结构关联中,才能存在哲学话语的重大语用学意义。

作为时代变革的思想先导,实践观成为马克思哲学发动和引导时代变革的关键。170多年前,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gegenständlich】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引者对翻译文字略有改动)<sup>[2]</sup>(P134)从实践出发看“人的思维对象性的真理性”,摈弃一切超实践的经院哲学争论,一条哲学革命道路因而被开辟出来。可见,马克思正是从实践观上发动了哲学革命,深刻批判了“神圣世界的异化”和“非神圣世界的异化”,而使新世界观出场的。马克思批判地清算自己以往神圣和非神圣意识形态的信仰、解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霸权,从此走向历史深处,创立唯物史观;批判地解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揭破资本的秘密;批判地解构一切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出场逻辑。80多年前,毛泽东正是在《实践论》等著作中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清算党内教条主义,开创崇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进而创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4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又在实践观上发动了一场思想变革,破除“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从而为开创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拉开序幕。可以说,这一事件是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和毛泽东用《实践论》清算教条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伟大继续,是用哲学变革开创时代变革卓越精神的伟大继续。

破除思想僵化,哲学批判就成为时代变革的清道夫。从出场学意义上看,“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之间的对立,首先是两种思想路线、两种思维走向的对立。思想守成与变革的对立,呈现出环节相同、方向相反的拉链式的对称结构。守成是拉链的闭合一方,起于存在而终于话语,即某种哲学、思想观念是历

史出场结构合法性守护和精神支柱。变革是拉开一方,思想解放成为变革时代的精神先导和首要条件。思想论争只是政治结构和道路选择的哲学表达。思想绝不会孤寂在场,在思想背后总是站着需要其在场、支撑其在场的社会利益结构,决定着思想的出场和在场。思想与之关联,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结构”。我们只有透过思想之争才能深入发现思想所表达的社会结构和道路选择。这就进入了出场学论域。

思想变革为政治变革廓清道路。“文革”结束,希望改革现状的人们需要改变新的政治架构,当然就有政治之争。思想为政治变革提供先导,政治变革为思想变革提供政治支持和保障。没有政治支持,思想变革就会徒劳无功。因此,哲学与政治总是联结的。思想可以以完全抽象的哲学形式加以呈现,但是这决不能改变它所必然在出场学意义上具有的政治语用学性质。如果没有邓小平、胡耀邦等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支持,这一场大讨论是很难在全国展开的。反之,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和领导集体的新旧更替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也成为“以学术讲政治”的典范。

思想之争背后催生的政治变革也不是目的。思想变革、政治变革的根本宗旨,是为了重新选择中国道路,找到一条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思想之争、政治之争的背后是道路之争。道路之争的检验标准,只能是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需要和奋斗实践。究竟是走传统社会主义和“文革”老路还是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选择权在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历史的在场主体,民心所向决定一切。推动思想解放、历史转折的真正主体,不是思想,甚至也不是少数政治家,而是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或标签,而是历史的真谛。因此,思想出场,如果脱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因此,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第一个重大启示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民的哲学,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利益之根本即哲学根本;人民需要之所向即哲学所向;人民奋斗的宗旨即哲学追求。哲学不过是人民心声的抽象表达。因此,哲学批判原初的认识论命题,就转化为社会存在论或历史观问题: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究竟何种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致富、民族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换言之,采取何种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尽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富起来的愿望?这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问题。实践检验就不再限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进而转化为关切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观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最终做出了历史选择。社会主义不过是人民需要的满足方式。在人民强烈的需要面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速度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更快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强烈需要,且只有在确定选择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之后才能充分显现。“宁要、勿要”的“文革”逻辑造成的危局证明老路违背人民意愿,不能走也走不通。人民对致富道路的选择决定了中国命运,造就了新的政治格局的强烈时代需要,进而造成冲破旧格局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有特殊历史场域才能造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出场,成为一个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启的重大转折。40年中国奇迹证明这一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社会检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实践当然也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固然有邓小平等伟大政治家,但是,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自发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苏南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40年来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的国家和民族的壮丽史诗,说明了人民群众之中蕴藏着巨大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蕴藏着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40年的实践有力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sup>[3]</sup>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第二个重大启示是:实践检验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真理发展无止境。在时代和历史迅猛发展的潮流面前,任何僵化的思想都将被淘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sup>[3]</sup>以实践标准为突破口的哲学批判

不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更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重构了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观的讨论再一次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撬动历史大门的哲学杠杆也并没有止步于起点,其作用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始终并日用日新,始终成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因此,这一起点在实践上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在理论上意味着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起步。中国道路与哲学表达之间,相互激荡、双向促进、同步创新、共同发展,呈现出双向繁荣、持续创新的出场史。在每一次中国道路需要改革深化之际,哲学批判都作为破除旧观念、布展新观念的哲学精神而始终在场,并不断推进道路探索 and 理论创新。正是由于这一内在驱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不断走向21世纪。4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土壤中产生了两大思想飞跃,因而出现了两大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第三个重大启示是: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开放精神永存,但是在改革中出场的思想和方式绝不能僵化。具体来说,改革开放路径探索的方式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程。我们反思40年改革史应当有辩证的分析。改革初期破除僵化的观念崇拜导向了感性实践探索,前无古人的探索要求依靠实践“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仅仅诉诸感性探索的改革开放方式必然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盲目性。摆脱观念崇拜,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由于缺乏自觉理性指导,只讲实践、不问真理,自发的实践崇拜、盲目探索使改革走了不少弯路,交了许多学费,付出了若干代价。二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式、碎片化改革方式充满断裂。改革战略和制度的连续性、衔接性差,常常出现环节脱节、制度真空和规制失灵现象,不仅会引发各种腐败和违法现象,而且使人民缺乏稳定感、规制感、安全感。此外,渐进的改革方式容易把阶段性中不尽合理的利益格局固化,一切有权力的部门会利用改革的设计权和掌控权优先获利并将这一利益固化为一种垄断的社会结构,进而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极大障碍。三是渐进的感性探索缺乏终极目标和改革方向的指引,容易导致偏离改革初心和方向,也容易造就普遍的改革心理和动力疲乏。人民支持改革、推动改革,但是绝不支持没有明确终极目标和顶层设计的折腾。人民希望有明确终极目标的改革,希望有改革的时间表、对标表和路线图把科学社会主义落到实处,正如人类社会运动是永恒的但并不排斥我们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一样。今天,我们不能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决不能搞没有目标引领的改革,就像改造一座大楼却没有定型的改装图纸一样,边改边设计,往往导致前后矛盾、充满风险。因此,发展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时少。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需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而更坚定地开辟中国道路的新未来。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sup>[4]</sup>反思这一历史,使我们今天可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真理源于实践、取决于实践,但真理必须高于实践、自觉引领实践。摸着石头过河是为了摸规律。在实践中我们不能放弃理性思考的权利,而仅仅把命运交给感性活动。理性自觉、思想引领和顶层设计是今天改革的必由之路。首先,破除观念崇拜—诉诸感性实践探索—重新确立思想引领和理性自觉,40年改革开放呈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辩证曲线。其次,僵化模式—渐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呈现这一辩证历程。最后,这一辩证过程的总核心,就是打破僵化的社会主义老路模式—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坚持和完善这一中国道路,推动其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有了新境界,她源于前两个阶段,但又在道路模式上高于以往。任何把某一阶段改革开放成果和格局固化进而僵化的产物,都必将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加以破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在主要矛盾不断变化中前进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就是运动。因此,社会主义也是不断改革的社会。由于改革开放的探索性和渐进性,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之间、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之间不相适应,还有若干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全

面深化改革依然是走向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

## 二、重启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标准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哲学批判仅仅是一系列批判的序幕。实践标准一旦进入中国道路探索的历史观领域,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关于真理检验的讨论层面,而是要同时进入价值层面。也就是说,实践不仅要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要成为检验是否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需要的价值标准。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检验道路选择是否恰当的最高价值标准。这一历史观只有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实现。正如马克思当年通过历史批判、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历史深处,发现唯物史观,进而用唯物史观重新对资本作更深入细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不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能建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也就不可能真正开启走向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目标的中国道路。

中国 40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三项重大使命。第一是对当代资本历史功能作新的辩证批判。这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有关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续写,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于资本创新逻辑和中国道路状况所做出的理论贡献。第二是否定以苏联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为蓝本建构的经济体制,同时批判地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而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是摆脱以 GDP 等财富崇拜为核心的西方经典现代性发展经济学思路,建立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实践证明,40 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建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摆脱贫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 GDP 和收入均进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民初步富裕起来。中国人民衷心感谢和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4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重建道路就没有问题,不需要反思。反思 40 年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重建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同样有若干重大启示。

启示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了资本的二重性,即充分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最终战胜和取代资本创造条件,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认识和实践既源于马克思,又不是马克思原初设想的再版,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实践上利用好资本的积极作用快速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探索中形成的对资本创新逻辑作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产物。没有资本批判,就没有马克思。正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的历史二重性作了最深刻、最全面、最科学的解析。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在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以及造就了现代全球史方面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和“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论》),德里达曾就此感叹:这是对资本的“最高褒奖”。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揭破了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及其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指明了资本必然导致系列危机,最终导致剥夺者要被剥夺、外壳要被炸毁、丧钟就要敲响的覆灭命运。《共产党宣言》用最响亮的口号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2]</sup>(P414, 413)。这一消灭只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自我否定,资本的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最终战胜资本的后资本道路必然要榨取一切资本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成果才有可能。囿于当时条件,马克思设想消灭资本的革命是在资本逻辑发生的最高点上的世界同步革命;即便落后的俄国等东方国家率先革命,也必然成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步革命的信号并相互补充,而且还要获得资本世界的一切生产力、资金和文化成果才有可能。

尽管“两个必然”的历史逻辑一再显现,然而,世界革命的具体进路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原初设想的在资本较为发达的西欧先行的路线前进,而是率先在落后的东方俄国率先爆发十月革命。列宁认为,革命后取得政权的苏维埃可以充分利用政权的力量汲取资本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即开启社会主义条件

下利用资本文明成果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因而有了“社会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电气化”的著名公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经济文化上更加落后,“一穷二白”,更需要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力量发展经济。改革开放是全面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重大探索。中国不仅大力吸引外资、大力发展民资,而且国有经济也全面采取资本形式。资本第一次在中国获得了全面存在的形式。资本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到前此以往的最高历史水平。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资本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取得了重大成就。实践证明:在低于资本世界历史水平的国家和民族,积极利用资本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资本也在努力创造条件伴随世界历史前行。我们驾驭资本还要善于利用资本的创新逻辑。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强大的资本在内部不断创新变革的结果。当代资本为了暂时摆脱危机和寻求新的获利空间,不断创新资本要素、领域和形式,只要有可能,资本就必然将一切社会要素对象资本化并将其中一切能够带来最大利润的要素对象领域变成产业的主导领域,外在地释放出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作用,相继出现了金融资本、数字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甚至消费品资本等等形式,将资本主导形态从当年马克思所面对的工业资本推向后工业资本,推动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转变。这就是资本创新逻辑。这一逻辑表明:发达国家的资本依然在周期性危机毁灭和凤凰涅槃式重生中持续在场并千方百计地继续成为推动世界历史的杠杆。其后效应就是每一次创新都带来周期性的繁荣,同时又更深地跌入全球危机。资本不断突破地域限制、形式限制和空间限制,不断深度社会化、全球化,因而危机爆发对于世界历史的毁灭性影响也越来越剧烈。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地、历史地把握充分利用全球资本对科技创新、经济创新、社会创新、空间形态创新和文化创新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资本也在按照固有其本性对我们作另类牵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时空压缩中,共时重演着资本历史上从原始积累的疯狂掠夺到最“文明”榨取等各种获利方式,不断用金钱至上原则腐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甚至党内,在权钱交易中造就大量腐败。我们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资本也在无孔不入地利用我们。在与狼共舞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本逐利与人民利益之间,有合有分。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可能空想地超阶段地提前消灭资本,而是要积极利用和引导资本,使其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民的需要发挥积极作用,并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用法律和规制来约束资本的消极作用。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有效利用和规约资本力量,更好地为人民利益服务,为最终战胜和消灭资本创造条件,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启示之二,创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对马克思原初设想的超越,更是对以苏联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为蓝本建构的经济体制和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批判性否定。中国道路不是“东教条”也不是“西教条”的产物。我们创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原初设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社会主义措施时原初设想,在榨取最发达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之后,社会主义的“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用“共同的计划”来生产和分配产品。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希望根据历史发展对这一系列措施给予修订,强调: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2]</sup>(P376)。然而,社会主义革命最初爆发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资本扩张对于封建和小生产的世界历史性变革尚未彻底完成,“三座大山”的独特压迫结构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经济文化“一穷二白”的境地。因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特别是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并没有条件榨取同时代的资本全球化的一切成果,因而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总体上是长期低于世界历史水平的,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自主经济,因此,实现计划经济变成了国家对社会采取超经济、超社会化的强制,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的活力迸发和生产的极大发展的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学习苏联体制的进程中,毛泽东对反映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状况的苏联科学院经济学所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部分)》和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两本书中的种种问题就有所批判,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做了相应调整,写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等文献,这成为后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在当时的实践总框架上我们依然还是照搬苏联比较多。这一模式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生产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也建立了国家初级工业化体系,初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但由于存在高度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系、农轻重产业结构倒挂、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大众消费商品经济发展不足等问题,使中国长期不能摆脱普遍的物质匮乏状态,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希望尽快脱贫致富的需要,成为社会生产进一步快速发展的重大障碍,成为“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整套僵化的体制模式”,因而必须要改革。改革跨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转到“市场起基础资源配置作用”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市场起决定性资源配置作用”同时发挥政府的强大宏观调控作用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越来越清晰、完善。这一创制也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微观基础主体是私有制企业,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企业集群。西方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为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全面规约。在批判中重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中国道路的实践创新探索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企业、市场、政府、社会各个层级对资源配置的清晰的边界。然而,经过 40 年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依然面临若干问题。诸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如何更好地与市场机制协调、同时起引领作用;如何跨越西方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等陷阱;如何避免跌入导致两极分化的恶的市场机制和“中等收入陷阱”;在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中如何有效划分市场、企业、政府和社会的资源配置权力边界及明确的相互制约关系,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等等,都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

启示之三:开辟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必须要对西方经典现代性发展经济学教条加以否定。以物质财富增长和分配为核心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一度在中国的表现就成为 GDP 崇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原初是为了解决人民的脱贫致富问题,进而演化为一种对 GDP 的数字崇拜,变成与人民无关的资本财富的增长,变成了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指标。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经济学,是资本拜物教式的西方经济学的必然教条。在这一教条影响下,中国发展的初期出现了“三高—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工资)发展模式,为了挣够 GDP 数字,过度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压低了劳动者的收益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因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心相悖,也不可持续。打破这一教条,恢复“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的论,就要将“发展是硬道理”进一步深化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将实践检验精细化、科学化;就是要大力转变经济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推动以 GDP 崇拜为中心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为指导的高质量发展通道。然而,转型发展付出的代价巨大,遭遇的问题颇多。中国用数十年时空压缩的方式高速发展,问题的尖锐度和积累度也被同步放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一旦拒绝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老路,必然带来转型门槛和成本升高、价值负担偏重的问题。强调创新发展,必然要抛弃西方持有的低成本扩张模式。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实现共享发展,必然要强调效率服从公平。扩大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必然要变单纯的“请进来”、参与全球化经济转向为“内外一体”、引领全球化,必然越来越多地受全球“黑天鹅”风险影响,并与老牌世界霸权势力发生尖锐冲突。我们面对的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分配收入的不平衡以及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等,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总之,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不断登上新台阶。

### 三、僵化和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批判:中国道路的出场

中国 40 年的发展贯穿着一个总问题:从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和探索开始,到今天转换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用 40 年实践做出了解答。这一追问和解答的问答逻辑,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逻辑。中国道路“是什么”以及“如何是”的出场史,不仅是中国人民在 40 年的实践中攻坚克难的奋力开拓史,同时是不断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僵化和空想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话史。深思 40 年来的中国道路,我们可以有若干的启示。

启示之一,中国道路是在与老路和邪路的比较、斗争中开辟的,因而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创制过程。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分水岭,这 40 年间,改革开放使中国与“文革”前的老路渐行渐远,逐步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两条道路之间既在社会主义方向上一脉相承,又在社会主义具体进路上相互区别。新路的开辟并非一帆风顺。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遭遇大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一度也经历着暴雨狂风的洗礼。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福山《历史的终结》曾经狂妄叫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已经灰飞烟灭”,新自由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依然沿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批判地摆脱苏联僵化社会主义模式、各种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的模式过程中开辟出来的。我们既不走老路,更不走邪路,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老路或邪路方案提出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比如资本和市场、民主和自由、公平与正义、法治与领导权、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等等关系问题,中国道路的行进将始终受到老路和邪路的干扰和诱惑影响。

启示之二,中国道路也是在与各种反动的和空想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批判性对话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也必将在这一对话中继续完善。170 年前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不仅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理和道路,也不仅对各种反共产主义思潮和怪论进行了回击,同时也对各种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科学批判。这一批判表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批判就没有发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需要实践中开辟,还需要在与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和反社会主义思潮展开的批判地对话和论辩中出场。同样,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需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原则并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和检验,而且要在继续与当代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和僵化、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地对话中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始终面对各种当代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本质上是资本的意识形态。这一思潮不仅来源于全球资本主义,也来源于国内的资本和市场自发的意识形态。我们利用资本,资本也在对我们另类牵引。我们运用市场形式,市场所附着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在影响我们。这种新自由主义就是资本和市场原则在意识形态的彻底化。资本和市场所要求的微观基础,其完全的产权明晰的最高表现就是私有制。资本和市场所要求的宏观环境和商务环境,最高表现就是彻底的商品交换,把一切转换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最高效益)的资本化表现。资本和市场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最大化。按照彻底的平等交换原则和获利最大化原则安排人们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面对着资本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挑战。新保守主义将既得利益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因而或者表现为一种非社会主义的自由市场,或者表现为一种权钱交易的垄断的社会建构,甚至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甚至利用“稳定压倒一切”的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口号来掩饰和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结构。渐进的改革过程中一些权力部门利用手中的改革政策设计权和操控权对市场、资本、利益的把控,形成不尽合理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需要借口“稳定”来固化,反对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始终面对各种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只要我们的共享发展还

不能最终达到消灭一切经济和社会差别, 只要我们依然要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 只要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 那么, 主张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差别的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极左思潮就必然存在, 因容易博得下层民众的掌声而颇有市场。然而, 这些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当代再版。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在场的是目标规制的差异性社会。人民在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上趋向一致, 有共同利益, 如我们都拥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增进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等等。但同时局部利益、眼前利益、阶级阶层利益上又具有很多差别, 有些差别(地区、城乡、不同收入族群之间)还较大。现阶段的差别是无法彻底消灭的, 只能创造条件逐步缩小。现阶段超越差别的任何不切实际的思想、战略或政策都是对我们最终目标的极大损害。不管他们采取走老路或者用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思潮方式来诋毁和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质都是如此。走邪路和走老路, 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激进民粹主义、极左思潮是两极相通、互为因果的, 他们都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 但是不等于立即能够实现平均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我们的分配正义一定要以生产正义为基础, 共享发展必定以共建为前提, 而不能超越阶段地重搞“一平二调”、拉平分配。坚持基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始终面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挑战。在“后华盛顿共识”谱系中, 标榜“民主、人道和生态”的欧洲价值观, 采取福利国家政策一度成为国内某些人认同并争相推崇的对象。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在民粹主义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主张分配正义、超高福利而不消灭私有制, 比照我们先期发展相对忽略社会保障、人权的实践教训, 似乎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但是,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引发的欧债危机彻底暴露了这一制度和道路选择的内在不合理性。民众只想分得大蛋糕而不愿付出努力将蛋糕做大, 只讲分配正义而不强调生产正义, 在这一民粹主义的民主压力下, 各个政党只能走上用不断虚应满足民众超高福利诉求为手段争取上台执政之路, 必然导致政府债台高筑, 以至于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垮台。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道路。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可能是唯一的思想和道路在场。无论在全球或国内, 各种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方案都还将继续多元地存在, 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争鸣不会消失, 正如差异的社会中利益主体多元地存在一样。但是, 同样需要肯定的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最大共识, 她所谋求的利益是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因而具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和最广泛的人民支持。这是我们坚持道路自信最深层的根由。

#### 四、新时代中国道路: 出场指向与哲学表达

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告: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始终秉持 40 年道路不是照搬照抄既往经验, 而是要创新、发展、完善; 在解决 40 年间存在问题的意义上, 也是超越。这一发展和超越, 不是在一事一策上的超越, 而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上的超越, 是时代地平线的转换。新时代的中国道路, 既不会走 40 年前的老路, 也不会完全按照这 40 年的套路走, 而是创新和转折地走一条新路, 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 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重新规划和设计新时代中国道路。这一道路, 意味着在反思的基础上对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遭遇的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形式和超越形式,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一道路, 意味着从“世界走向中国”转向从“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为世界复杂的现代性探索了新文明路径, 为人类解答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进而为世界提供可以借鉴和推广的中国价值。这一道路, 意味着中国逻辑的真正完成, 呼唤中国逻辑的哲学表达, 即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当代出场。

新时代中国道路的设计和布展, 需要以系统评价 40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总体反思以及分析存在着的若干问题和矛盾为前提。新时代中国道路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

反思、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需要全面梳理和总结这40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需要系统分析存在的深层次、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需要找到新的方向、新的路径、新的战略和新的解决方案。进入由大变强的新时代绝不仅仅是经济数量的增长、改革和开放层级同构性的扩大、治理方式同质性的进化,更是一场涉及整个体制机制、发展路径、社会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深刻变革和深刻革命。从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感性改革探索向自觉顶层设计、思想引领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资源配置方式、发展动力和方式、空间治理方式、社会治理方式、政治治理方式、文化治理方式、生态治理方式、全球治理方式、政党治理方式等等都要发生根本转变。一个崇尚实践自觉性、系统性、长效性、战略性的发展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国逻辑包括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中国逻辑首先是建立在5000年文明史基础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统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包含着中国革命的逻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系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而不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结论和外国革命经验跨界平移到中国。同样,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并将之推进到新时代。作为实践逻辑,中国逻辑是在中国大地上从事革命和发展实践的产物。中国实践是形成中国逻辑的创世基础。作为理论逻辑,在系统总结探索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生了三大理论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大理论成果。

新时代中国道路意味着中国逻辑正在为人类新文明提供中国方案。进入21世纪,全球东西方关系发生着翻转。一向从属于西方的东方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迅速崛起,而西方霸权则在金融危机中遭遇沉重打击。全球发展的轴心正在东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从170多年来的“世界走向中国”向“中国走向世界”转变。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逻辑。现代性内在矛盾是复杂的,现代性道路也是多元的。资本的现代性道路必然引发人与人、人与自然、全球文明之间的根本冲突,因而必然要在历史上退场的。列宁引领的十月革命开辟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一探索的后篇经历了苏东剧变。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探索经历了170年,其间有各种东方和西方的模版,但是最终都归于失败。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的现代性道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逻辑,才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和富起来,进入民族复兴的快车道。170年的实践检验表明: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比较别国的路,前瞻未来的路,我们才真正有道路自信。如果说,在“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我们注重的是结合本土状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使之在中国具体化,彰显“中国特色”;那么,在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重心将是如何使中国理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世界化,受众发生变化,对象发展变化,就要更多地考虑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就要使“中国特色”变成“后中国特色”,即普遍化。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具有极大的发展与和平价值的,是开启和平发展新文明道路的重大措施。但是,相关者民族不同、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因而同一个倡议在不同民族国家落地就有各个不同的路径和方式。我们不能局限于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以己度人”,而是要超越自己的国家限度从对象状况出发,才能达到共享发展的佳境。

新时代中国道路呼唤哲学表达,即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当代出场。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当代使命,就是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全面、深刻、准确地表达中国逻辑。概言之,40年前从哲学变革开始的当代中国逻辑,在经历如此生动而伟大的感性实践探索之后,需要回到哲学,产生一个能够代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哲学表达。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讲话. 人民日报,2018-05-30.
- [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7-02-14.

## The Great Debate on the Standards of Truth: Its Way Out and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Ren Ping*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has often witnessed self-existent or self-conscious reflection. Not only is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st history, but it refers to the end of an era and which declar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The great debate on the standards of truth 40 years ago became the ideological forerunner of the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40 year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finally entered a new era, by restarting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political-economic criticism and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model and creating a new path. Today, we are standing in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 the mystery of the emergence of that key event still needs us to be analyzed,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s path still needs us to be re-understood. On the basis of present-logy vision, we would analyze the depth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great debate on the standard of truth, making a study of interpretation for practice as the appearance of connection between truth and value standard, and making present-logical research of China's road and Chinese logic.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pened up by the great debated on standard of truth, and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at the new era of China express road need to be expressed philosophically, need to call for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ppear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all the more need to use China's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profound and accurate expression of Chinese logic.

**Key words** standards of truth; standards of valu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Era; Reform and Opening Up; philosophy critique

---

■ 收稿日期 2018-06-10

■ 作者简介 任 平, 哲学博士,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 江苏 苏州 215006。

■ 责任编辑 涂文迁